

普惠金融發展、經濟發展水平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

肖志源*, 譚戈平

(澳門科技大學商學院, 澳門)

摘要: 近年來, 國家鼓勵普惠金融業務全面開展, 國家的鼓勵政策不但能夠幫助農村貧困人群脫貧增收, 進而為鄉村振興戰略的成功實施提供了有力支持。本文首先以我國31個省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數據為研究樣本, 運用固定效應模型對發展普惠金融能否增加農村居民收入進行了實證檢驗。其次, 本文特別考察了《規劃》及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出, 能否加強普惠金融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增長作用。最後, 本文考察經濟發展水平對普惠金融發展與農村居民收入之間關係的影響。實證結果表明《規劃》的出臺能顯著提升農村居民收入, 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地區發展普惠金融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顯著強於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地區。本文進一步用分位回歸法驗證了此結論是穩健的。

關鍵詞: 普惠金融; 經濟發展水平; 農村居民收入; 減貧效應; 門檻效應

The Impact of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on Rural Residents' Income

Zhiyuan XIAO*, Kwo Ping TAM

(School of business,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implemented national wide policy to promote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IF) services. Such promotion policy is a key measure to help the rural people to alleviate poverty and increase income. Further the policy provides strong suppor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First, this study applies a fixed effect model to test whether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can increase the rural residents' income, by analyzing the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 from 2011 to 2018. Second, this study further investigates whether "Inclusive Finance Development Plan (2016-2020)" and the subsequent measures can strengthen the role of inclusive finance in promoting rural residents' income. Las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whet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alt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and th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Evidence suggests that the national promoting policy has significantly strengthened the impact of inclusive finance on improving rural area income. Also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has a stronger impact on rural residents's income in the lower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as than that in the hig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as. Further robustness check on the conclusion is conducted via quantile regression.

Keywords: Inclusive Finan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Rural Residents' Income; Poverty Alleviation Effect; Threshold Effect

收稿日期: 2020-06-23; 修訂日期: 2021-03-15。

基金項目: 澳門科技大學研究基金資助項目 (FRG-19-012-MSB)、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資助項目 (0092/2018/A3)

*通訊作者: 肖志源, 女, 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公司金融。

本文作者感謝丁浩副教授、曾寧副教授給論文草稿提供有用的建議, 同時也非常感謝匿名審稿人提出的寶貴建議, 文責自負。

0 引言

中央政府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特別是在貧困地區”，把農村貧困人口脫貧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最突出短板”，聚焦深度貧困地區和特殊貧困群體重點發力。如何增加農村居民收入、尤其是貧困地區農村居民收入成為舉國上下重點關注的問題。在此背景下，精準扶貧概念應運而生，精準扶貧措施相繼出臺，隨著精準扶貧工作的深入開展，其中的關鍵是要增強貧困戶和農戶的自我發展能力，如何發揮金融的造血功能，為農業、農村、農民三農問題服務，如何增強農村的資源整合能力，提高扶貧開發成效，從根本上解決農村的貧困和長期發展問題也就成為了亟待需要研究的重要課題。

國家對此高度重視，國務院於 2015 年發佈了《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以下簡稱《規劃》），《規劃》提出要大力發展農村地區普惠金融、加大對農村地區金融資源的投入，增強農村地區金融服務可獲得性，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打贏脫貧攻堅戰。《規劃》的出臺顯示了國家對農民增收問題的重視，各地相繼的配套措施也陸續跟進。《規劃》出台以後，鼓勵政策是否進一步增強了普惠金融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增收效果？本文首次驗證、量化普惠金融鼓勵政策對促進農村居民收入的效果。

普惠金融對不同地區農民收入的影響是否一致呢？只有通過科學的驗證才能證實差異是否存在，政府部門才能精確地掌握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地區農村居民能從普惠金融發展中所獲得的益處，才能更有針對性地制定政策。本文運用面板回歸模型驗證經濟發展水平對普惠金融發展與農村居民收入之間關係的影響，驗證是否是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地區發展普惠金融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增收效應會更顯著，以期為政府部門向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地區提供更多、更精準的金融服務、普惠金融支援向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地區發生傾斜提供

理論支撐，也為深化農村地區金融體制改革、拓寬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地區普惠金融的廣度和深度尋找現實依據，從而為實現鄉村振興有所裨益，發揮金融的造血功能，打贏脫貧攻堅戰。

1 文獻綜述

普惠金融（financial inclusion，亦稱為包容性金融）概念最初被聯合國用於“2005 年國際小額信貸年”的宣傳中，後被聯合國和世界銀行大力推廣。2005 年後，普惠金融的概念引入中國，並得到中國政府的認可。2013 年 11 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發展普惠金融。2015 年底，國務院發佈《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明確了普惠金融的定義：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機會平等要求和商業可持續原則，通過加大政策引導扶持、加強金融體系建設、健全金融基礎設施，以可負擔的成本為有金融服務需求的社會各階層和群體提供適當的、有效的金融服務^[1]。

伴隨著普惠金融概念的提出，學術界就金融發展與農村居民收入的關係展開了研究，但並未就兩者關係達成共識。部分研究認為普惠金融發展會顯著提升農村居民收入（陳慧卿等，2021；何宜慶，2020；陳丹，姚明明，2019；劉錦怡，劉純陽，2020；黃倩，2019；Sandip，2015）^[2-7]。普惠金融發展對提高農民收入有直接和間接增收效應，直接效應指的是普惠金融通過互聯網、大數據等技術增加了金融借貸機會、大大降低了金融交易的成本和門檻等（周利等，2021；劉長庚，羅午陽，2019；Batuo，2010；Esmail，2008；Kovtun，2014）^[8-12]；普惠金融的間接增收效應指的是增加農村居民的就業創業、促進經濟增長和改善收入分配等機制間接提高農村居民收入（羅新雨，張林，2021；劉錦怡，劉純陽，2020）^{[13][5]}。

但也有部分學者提出不同的看法，金融發展無法提升農村居民收入。溫濤等（2005）用農村金融機構的信貸比率和居民的儲蓄比率兩個指標來衡量農村地區金融情況，認為我國農村金融

發展與農民收入增長顯著負相關^[14]。許崇正等（2005）認為信貸對農民收入的影響不顯著，發展金融並不能提高農民收入^[15]。孫玉奎（2014）也認為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民收入的影響非常有限^[16]。余新平（2010）研究了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農村金融資料，研究結果表明農村存款、農業保險賠付與農村貸款、農業保險收入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並不一致甚至是相反的^[17]。林秋斌（2018）構建了農村金融發展效率和農村金融發展規模指標，認為金融發展效率指標會抑制農民增收，金融發展規模變量跨過某個門限值時，對農民增收的影響會由負轉正^[18]。李鶴（2019）構建了農村金融規模指標、結構指標以及效率指標，其對農民增收的影響並不一致^[19]。

同時也有研究認為普惠金融的增收效應有明顯的異質性，不同區域、不同群體從普惠金融發展中獲益程度不一。陳慧卿等（2021）認為中部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的農村增收效應最大，其次是東部，最小的為西部，但差異並不明顯。同時，數字普惠金融對中西部農村地區減貧效應的邊際貢獻要遠高於東部地區^[2]。何宜慶等（2020）認為數字普惠金融的增收效應表現為東部最強，西部次之，中部最弱^[3]。黃倩等（2019）用分位回歸法研究各群體是否平等地受益於金融發展，研究表明弱勢群體的數字普惠金融邊際貢獻更高。文章認為原因可能是傳統金融機構“嫌貧愛富”的特質使富人原本就具有較高的金融資源可得性，使得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對富裕群體的金融資源可得性影響較小，而對貧困群體的影響較大^[6]。莊曉棟、許澤慶（2019）發現當地區經濟發展處於中低水平時，普惠金融能夠明顯促進農村經濟增長，而當區域經濟處於較高水平時，普惠金融促進農村經濟增長的效應消失^[20]。趙丙奇（2020）研究發現在低經濟水平地區，數字普惠金融在低水平時，其發展會進一步拉大城鄉收入差距，在高水平時對城鄉收入差距縮小起到顯著的促進作用^[21]。

根據對文獻的梳理，可知現有研究對普惠金融的量化大致採用的是直接引用已有信貸、保險等金

融指標，借鑒 Mandira Sarma（2008）^[22] 的研究從金融服務的覆蓋面以及金融服務的使用程度等維度來構建普惠金融指數，採用北京大學構建的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指數三種方法。對金融發展的量化不同也是導致普惠金融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結論不一致的原因之一。在考量經濟發展水平對普惠金融與農村居民收入兩者關係影響時，莊曉棟、許澤慶（2019）、趙丙奇（2020）都只是根據經濟發展水平將全國分成高、中、低經濟發展水平區域，採用分組回歸的方法比較不同經濟發展區域普惠金融發展對農民收入的影響係數大小，分組回歸可能會忽略普惠金融發展與收入之間的非線性關係^[20-21]。同樣，何宜慶（2020）考察了《規劃》的出臺，普惠金融的增收效應是否會存在時間異質性，將樣本劃分為 2013—2015 年與 2016—2018 年兩個區間進行實證考察^[3]，通過比較前後兩個區間普惠金融發展回歸係數的大小得出來的結論同樣可能忽略了普惠金融發展與收入之間的非線性關係。

有鑑於此，本文將使用更全面的包括數位化金融維度在內的普惠金融指標，著眼於金融發展的減貧效應和門檻效應，使用面板資料構建回歸模型，探究普惠金融發展與農村居民收入之間的關係。再者，本文在回歸模型中引入《規劃》出臺虛擬變數和經濟發展水平與普惠金融發展的交乘項，以考察普惠金融發展與農村居民收入之間的非線性關係。因此本文提出的實證分析可以驗證《規劃》出臺後採取的一系列措施是否有助於加快農民增收的步伐，尤其是調查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地區發展普惠金融是否能夠顯著提高農民收入。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假設

周澤炯（2014）在借鑒其他研究的基礎上認

為金融發展影響居民收入的效應之一就是減貧效應^[23]。所謂減貧效應指的是通過發展普惠金融，為金融需求者提供包含儲蓄、信貸、匯兌和支付以及保險在內的金融服務，讓廣大群眾享受到普惠金融帶來的實實在在的好處，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縮小地區差異、城鄉差異。發展普惠金融能夠提高農民收入的機制在於：一方面通過為農村鄉鎮企業、農村個體戶、農戶等提供小額信貸金融服務，解決鄉鎮企業及農村個體戶融資難、融資成本高的問題，為農業生產、生活提供資金支援，增加農村就業機會，提高農民收入。另一方面通過增加金融機構服務網點、提高農村地區金融服務的滲透率與可得性，將更多的居民納入金融服務的範疇，使更多的農村居民獲得投資的機會，提高非農收入。同時，金融服務的規模效應也會降低金融服務的經營成本，使農村居民能夠以更低的价格享受到更高的服務。

根據金融發展的減貧效應，提出待檢驗的研究假設 1：

假設 H1：普惠金融發展與農村居民收入之間正相關，即發展普惠金融能夠提高農村地區居民收入。

作為普惠金融發展的第一個國家級戰略規劃，《規劃》的出臺足見國家對普惠金融發展的重視。在《規劃》的指導下，一系列關於發展農村普惠金融措施相繼實施，為解決三農問題和提高農村居民收入從實踐上提供了新的思路。一方面針對三農領域的金融支持力度不斷加大，銀保監會的資料顯示，截至 2018 年年底全國銀行業金融機構涉農貸款餘額、普惠性涉農貸款餘額分別為 33 萬億元、5.63 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 5.6%、10.52%；扶農小額信貸餘額為 2488.9 億元。另一方面普惠金融服務也不斷向基層、縣城、鄉村和社區延伸，截至 2018 年年末，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鄉鎮機構覆蓋率為 96%、保險機構鄉鎮機構覆蓋率為 95%、全國行政村基礎金融服務覆蓋率為 97%。

一系列措施使普惠金融的覆蓋廣度和使用深度不斷向農村地區滲透，根據上文的分析，據此

提出假設 2：

假設 H2：《規劃》的出臺及之後一系列發展普惠金融的措施能加快農民增收的步伐，也即《規劃》出臺後普惠金融發展對農民收入的正向作用大於《規劃》出臺前。

金融發展的門檻效應會阻礙有金融需求的人通過正常管道獲取金融服務，也就是說並不是每一個有金融需求的人都能夠即時、快速地以合適的、負擔得起的價格獲得所需的金融服務，這就是金融發展的門檻效應，這個門檻體現在獲取金融服務的難易程度及為獲取金融服務所支付的成本。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地區的鄉鎮企業、農戶本身的經濟實力較弱，可供抵押的資產少，很難通過正規渠道獲取生產、生活所需的資金。同時經濟發展水平低地區的金融機構數量相對較少、金融服務滲透率低，這一系列的客觀原因都使得低收入地區農民很難獲得金融服務，他們的金融需求長期處於被壓抑狀態，金融需求長期得不到滿足，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很難打破這種局面。而普惠金融的發展就是要通過政府這只有形的手讓低收入地區農民也能夠以合適的價格享受到金融服務。因此，一旦在低收入地區發展普惠金融，滿足農民、農業、農村的金融需求，那普惠金融所帶來的農民增收效應會更顯著。

根據以上的分析，提出待檢驗的研究假設 3：

假設 H3：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地區的普惠金融農民增收效應顯著強於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地區。

2.2 計量模型與變量說明

為了驗證本文的研究假設，本文構建了面板多元回歸模型，但如果用當期的普惠金融發展、當期的農村居民收入來構建模型，則有可能存在內生性問題。本文參考 Lin et al.(2015)、Huang and Zhao(2016) 採用滯後一期法^[24-25]，三個回歸模型都引入上一期的普惠金融發展變量來消除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上期的普惠金融發展會影響本期的農村居民收入，但本期的農村居民收入卻不會

影響上期的普惠金融發展，因此上一期的普惠金融發展就視為外生。

為了驗證研究假設 1：普惠金融發展會正向影響農村居民收入，本文借鑒黃倩等（2019）^[6]的研究，構建如下基礎回歸模型：

$$\begin{aligned} \ln(Y_{i,t}) = & \beta_0 + \beta_1 IF_{i,t-1} + \\ & \beta_2 ES_{i,t} + \beta_3 UL_{i,t} + \beta_4 Open_{i,t} + \\ & \beta_5 IS_{i,t} + \beta_6 GE_{i,t} + \beta_7 Province_{i,t} + \\ & \beta_8 Year_{i,t} + \varepsilon_{i,t} \quad (\text{公式 1, 基礎模型}) \end{aligned}$$

其中， β_0 為截距項， $\varepsilon_{i,t}$ 為殘差項， $\beta_1 - \beta_7$ 為待估算的回歸係數，表 1 給出了模型中變量的定義。

為了驗證研究假設 2：作為第一個國家級戰略規劃，《規劃》的印發及之後提出的一系列發展普惠金融的措施能加快農民增收的步伐，本文引入《規劃》虛擬變量，通過判斷虛擬變量和普惠金融交乘項的係數符號來判斷政策措施是否有效。回歸模型 1 如下：

$$\begin{aligned} \ln(Y_{i,t}) = & \beta_0 + \beta_1 IF_{i,t-1} + \\ & \beta_2 Policy_t + \beta_3 IF_{i,t-1} \times Policy_t + \\ & \beta_4 ES_{i,t} + \beta_5 UL_{i,t} + \beta_6 Open_{i,t} + \\ & \beta_7 IS_{i,t} + \beta_8 GE_{i,t} + \beta_9 Province_{i,t} + \\ & \beta_{10} Year_{i,t} + \varepsilon_{i,t} \quad (\text{公式 2, 模型 1}) \end{aligned}$$

模型 1 在基礎模型的基礎上引入普惠金融發展與《規劃》出臺的交乘項 $IF_{i,t-1} \times Policy_t$ ，公式 2 中 β_3 參數反映政策出臺後發展普惠金融對農村居民收入的額外影響。

為了驗證研究假設 3：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地區的普惠金融農民增收效應顯著強於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地區，本文構建如下回歸模型 2：

$$\begin{aligned} \ln(Y_{i,t}) = & \beta_0 + \beta_1 IF_{i,t-1} + \\ & \beta_2 EDL_{i,t} + \beta_3 IF_{i,t-1} \times EDL_{i,t} + \\ & \beta_4 UL_{i,t} + \beta_5 Open_{i,t} + \beta_6 IS_{i,t} + \\ & \beta_7 GE_{i,t} + \beta_8 Province_{i,t} + \beta_9 Year_{i,t} + \varepsilon_{i,t} \quad (\text{公式 3, 模型 2}) \end{aligned}$$

模型 2 在基礎模型的基礎上引入普惠金融發展和經濟發展水平的交乘項 $IF_{i,t-1} \times EDL_{i,t}$ 。公式 3 中 β_3 參數乘以經濟發展水平（ $\beta_3 EDL_{i,t}$ ）反映了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單位普惠金融發展對農村居民收入可以有不同的影響。考慮了交乘效應後，發展普惠金融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係數為 $\beta_1 + \beta_3 EDL_{i,t}$ 。

(1) 農村居民收入（Y）：本文借鑒現有研究的做法，以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來測量農民收入。

(2) 普惠金融發展（IF）：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從數字金融覆蓋廣度、使用深度以及數字化程度 3 個維度，選取 33 個具體指標來構建數字普惠金融指標體系，將多個指標合成一個數字普惠金融指數。郭峰等（2020）首先將性質和計量單位不同的指標進行無量綱化處理，然後採用了主觀賦權與客觀賦權相結合的方法來確定不同指標合成時的權重。對於“使用深度”層面下的 6 個金融業務維度，郭峰等按照金融服務的門檻（複雜性和風險性）和普及程度來確定權重；對於“數字化程度”層面下的 4 個維度，按照其對實際生活影響的重要性和業務成熟程度來確定權重。最後選用了算術平均合成模型來合成指數，具體指數合成時是由下往上逐層匯總而成，先計算各層分組指數，然後由各層分組指數加權匯總得到綜合指數^[1]。

(3) 《規劃》出臺（Policy）：國務院於 2015 年 12 月 31 日印發了《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 年）》，提出到 2020 年建立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相適應的普惠金融服務和保障體系，在此《規劃》的指引下一系列發展措施相繼出臺。因此，文章以此為分界點，2016 年及之後的年份賦值為 1，2016 年以前賦值為 0。

(4) 經濟發展水平（EDL）：經濟發展水平為虛擬變量，本文借鑒 Li and Zhang(2010) 的研究^[26]，各省市當年的人均 GDP 低於全國人均 GDP，則認為經濟發展水平低，賦值為 0；否則認為該省經濟發展水平高，賦值為 1。

為了控制其他因素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參考已有研究，本文選取如下控制變量：城鎮化水平 UL、對外開放水平 Open、產業結構 IS、

政府財政收支 GE、經濟情況 ES、省份啞元變量 Province 以及年度啞元變量 Year。表 1 是具體的變量說明。

表 1 主要變量名稱及說明

變量名稱	變量符號	變量說明	符號預測
農村居民收入	Y	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普惠金融發展	IF	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	+
《規劃》出臺	Policy	2016 年及之後為 1，2016 年以前為 0	+
經濟發展水平	EDL	各省份人均 GDP 高於全國人均 GDP 則認為經濟發展水平高，賦值 1；否則為 0	-
城鎮化水平	UL	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值	+
對外開放水平	Open	各省進出口總額與實際 GDP 的比值	+
產業結構	IS	各省第三產業占 GDP 的比重	+
政府財政收支	GE	政府財政收支占 GDP 的比重	+
經濟情況	ES	各省份人均 GDP	+

3 實證結果及分析

本文選取 2011-2018 年全國 31 個省市 8 年的面板數據作為研究樣本。其中普惠金融數據來自於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課題組發佈的 2011—2018 年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1]，其他數據來源於 2012-2019 年《中國統計年鑒》。由於數據差異較大，本文對數據統一進行了取對數處理。

3.1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在回歸方程中，由於變量之間的差異較大，考慮到數據的平穩性和異方差問題，本文對數據進行了取對數處理，但為了更清晰地描述普惠金融發展情況以及我國農村居民收入之間的差距，在進行變量的描述性統計時，報告的是未進行對數處理的資料，表 2 給出了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表 2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表

變量	樣本數	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農村居民收入 Y	248	11334.49	4729.30	3909.37	30374.73
普惠金融發展 IF	248	186.96	84.92	16.22	377.73
經濟發展水平 EDL	248	0.37	0.48	0	1
城鎮化水平 UL	248	56.13	13.25	22.71	89.60
對外開放水平 Open	248	27.02	30.87	1.69	154.82
產業結構 IS	248	45.70	9.47	29.7	81
政府財政收支 GE	248	39.41	21.96	18.65	151.46
經濟情況 ES	248	52107.73	24734.77	16413	140211.2

描述性統計結果顯示農村居民收入的均值為 11334.49、標準差 4729.30、最大值 30374.73、最小值 3909.37，可知從 2011-2018 年我國農村居民收入有顯著提高，但地區差距依然存在。2019 年統計資料顯示：2018 年農村居民收入最低的是甘肅省，人均 8804.13 元，最高的是上海市，人均 30374.73 元，是甘肅省農民人均收入的 3.45 倍。普惠金融發展同樣不均衡，地區差異較大，該指數的均值為 186.96、標準差 84.92、最小值 16.22、最大值 377.73。經濟發展水平的均值為 0.37，標準差是 0.484，說明大部分省份的人均 GDP 低於全國平均 GDP，大部分省份的經濟發展水平較低。

3.2 回歸結果分析

由於本文使用的資料為平衡面板資料，在進行回歸之前，本文先對模型進行了 F 檢驗，主要是為了判斷模型是否存在個體效應。結果顯示，基礎模型和模型 1、2 的 F 檢驗 P 值為 0，故我們拒絕原假設，對各參數進行估算時不能使用混合回歸法，應允許每個省份擁有自己的截距項。而究竟是使用固定效應還是隨機效應模型，本文用豪斯曼來檢驗，檢驗結果見表 3 所示。3 個模型都強烈拒絕原假設，認為應該使用固定效應模型來估算參數值。同一省份在不同時期的擾動項之間往往存在自相關的問題，因此我們在估算標準誤差時使用的是聚類穩健的標準誤差。

表 3 豪斯曼檢驗結果

	基礎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豪斯曼統計量	282.48	42.33	69.98
P 值	0.0000	0.0000	0.0000

表 4 是模型的回歸結果，表 4 第二列報告了基礎模型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普惠金融發展與農村居民收入顯著正相關，普惠金融發展 1%，農村居民收入增長 0.069%，普惠金融發展的農民收入增收效應顯著，驗證了假設 1 的觀點。在影響農村居民收入的控制變量裡，城鎮化水平、對外開放水平、經濟情況、政府財政收支與農村居民收入顯著正相關。由於這幾個變量的分佈不一樣，所以不能直接比較回歸係數的大小來判斷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大小。借鑒 Lins et al.(2017)^[27] 的做法，本文通過比較這四個變量每增加一個標準差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來判斷。表 2 中普惠金融發展、城鎮化水平、對外開放水平、政府財政收支的標準差分別為 84.92、13.25、30.87、21.96，則這四個變量每增加一個標準差，農村居民收入分別提高 5.86 (0.069×84.92)、3.58 (0.27×13.25)、0.77 (0.025×30.87)、5.99 (0.273×21.96) 個百分

點。

表 4 第三列報告了模型 1 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普惠金融發展回歸係數為 0.070，在 5% 的顯著水平下相關；普惠金融發展與《規劃》出臺虛擬變量的交乘項為 0.078，在 1% 的顯著水平下相關。說明《規劃》出臺後，普惠金融發展提高 1%，農民收入顯著增長 0.148% (0.070%+0.078%)，《規劃》出臺前，普惠金融發展提高 1%，農民收入顯著增長 0.070%，驗證了研究假設 2。表明 2015 年出臺的《規劃》及一系列發展普惠金融的措施可以加快農民增收的步伐，政策和措施是有效的。其他控制變量回歸結果與基礎模型一致。

表 4 最後一列報告了模型 2 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普惠金融發展係數為 0.051，普惠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水平的交乘項為 -0.029，且在 5% 的顯著水平下相關，即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地區普惠金融發展提高 1%，農民收入增加 0.051%；而在經

表 4 普惠金融發展、經濟發展水平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

因變量：農村居民收入 $\text{LN}(Y_{i,t})$			
解釋變量	基礎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普惠金融發展 $\text{IF}_{i,t-1}$	0.069** (0.030)	0.070** (0.028)	0.051* (0.026)
《規劃》出臺 Policy_t		-0.250 (0.260)	
普惠金融發展和政策交乘項 $\text{IF}_{i,t-1} \times \text{Policy}_t$		0.078* (0.046)	
經濟發展水平 $\text{EDL}_{i,t}$			0.172** (0.065)
普惠金融發展和經濟發 展水準的交乘項 $\text{IF}_{i,t-1} \times \text{EDL}_{i,t}$		-0.029**	(0.012)
城鎮化水平 $\text{UL}_{i,t}$	0.270** (0.129)	0.364** (0.152)	0.190 (0.128)
對外開放水平 $\text{Open}_{i,t}$	0.025** (0.010)	0.024** (0.010)	0.021** (0.010)
政府財政收支 $\text{GE}_{i,t}$	0.273** (0.117)	0.273** (0.122)	0.268** (0.112)
產業結構 $\text{IS}_{i,t}$	-0.025 (0.045)	-0.013 (0.046)	-0.118*** (0.041)
經濟情況 $\text{ES}_{i,t}$	0.123*** (0.042)	0.099** (0.044)	
常數 C	6.701*** (0.600)	6.381*** (0.629)	8.962*** (0.551)
省份效應	控制	控制	控制
時間效應	控制	控制	控制
R-Square	0.8352	0.8448	0.6858
N	217	217	217

注：括弧中的值為穩健的標準誤差。*、**、*** 分別表示 10%、5% 和 1% 的顯著水平。

濟發展水平較高地區普惠金融發展提高 1%，農民收入增加僅 0.022%（0.051%-0.029%）。說明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地區發展普惠金融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增加效應要顯著強於經濟發展水平比較高的地區，驗證了假設 3 的觀點，經濟發展水平會影響普惠金融發展與農村居民收入之間的關係，在經濟欠發達地區發展普惠金融所帶來的增收效果更好。

3.3 穩健性檢驗

本文使用了穩健的標準誤差，對估算參數進行假設檢驗不受殘差存在異方差或非正態分佈的影響。為了驗證在經濟欠發達地區發展普惠金融

對農村居民的增收效應更顯著這一結論是否穩健，本文用分位回歸法進行穩健性檢驗，選取了 10% 分位、25% 分位、50% 分位、75% 分位、90% 分位這五個具有代表性的分位點，分位回歸結果見表 5。分位回歸結果顯示，隨著分位點數的上升，即農村收入群體由低收入群體向高收入群體移動時，普惠金融發展回歸係數估計值不斷下降。農村較低收入群體（10% 分位）的普惠金融發展係數（0.081）是農村較高收入群體（90% 分位）普惠金融發展係數（0.048）的近兩倍，且農村較高收入群體的普惠金融發展係數並不顯著，說明農村較低收入群體從普惠金融發展中的獲益更大，增收效應更明顯。這與模型 2 的結果一致，說明模型 2 的結果具有一定的穩健性。

表 5 普惠金融發展對農村不同收入群體的增收效應分位回歸結果

因變量：農村居民收入 $\ln(Y_{i,t})$					
解釋變量	10% 分位	25% 分位	50% 分位	75% 分位	90% 分位
普惠金融發展 $IF_{i,t-1}$	0.081** (0.040)	0.075** (0.031)	0.064*** (0.021)	0.053* (0.029)	0.048 (0.037)
城鎮化水平 $UL_{i,t}$	0.315** (0.155)	0.356*** (0.121)	0.435*** (0.084)	0.509*** (0.113)	0.546*** (0.142)
對外開放水平 $Open_{i,t}$	0.031** (0.015)	0.030** (0.012)	0.029*** (0.008)	0.028** (0.011)	0.028** (0.014)
政府財政收支 $GE_{i,t}$	0.186 (0.222)	0.240 (0.173)	0.347*** (0.120)	0.446*** (0.161)	0.495** (0.203)
產業結構 $IS_{i,t}$	-0.031 (0.076)	-0.020 (0.059)	0.003 (0.041)	0.024 (0.055)	0.034 (0.070)
經濟情況 $ES_{i,t}$	0.153** (0.075)	0.133** (0.059)	0.095** (0.041)	0.059 (0.055)	0.042 (0.069)
省份效應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時間效應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48	248	248	248	248

注：括弧中的值為穩健的標準誤差。*、**、*** 分別表示 10%、5% 和 1% 的顯著水平。

4 結論與建議

本文實證分析普惠金融發展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以及經濟發展水平是否會影響普惠金融發展與農村居民收入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表明：發展普惠金融會顯著提升農村居民收入，普惠金融發展 1%，農村居民收入增長 0.069%，在 5% 的顯著水平下正相關。在影響農村居民收入的控制變量中，城鎮化水平、對外開放水平、政府的財政收支以及經濟情況都會正向影響農村居民收入。作為普惠金融領域第一個國家級戰略，《規劃》的出臺及隨後一系列發展普惠金融的措施能加快農民增收的步伐，與《規劃》出臺前相比，《規劃》出臺後發展普惠金融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係數會高出 0.078 個百分點。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地區發展普惠金融給農村居民帶來的收入增收效應要顯著強於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地區發展普惠金融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係數會高 0.029 個百分點。

如何深化農村金融體制改革，讓普惠金融更好地為三農服務，真正發揮金融在脫貧攻堅戰中的作用，實現鄉村振興戰略。基於以上研究結論，本文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第一，對政府而言，應從政策上制定措施進一步降低農村金融服務准入門檻。金融發展門檻效應的存在使得農村偏遠地區的金融機構相對較少，一直以來銀行都是為農村提供金融服務的主要機構。經過多年發展，銀行在農村地區不論是在網點數量還是從業人員數量上都有大幅增長，但整體而言農村地區銀行類金融機構占總體銀行業金融機構比例偏低。保監會公佈的資料顯示，截至 2018 年 6 月底，農村商業銀行占銀行業金融機構的 28.68%，農信社占比 19.84%，而農村合作銀行占比則更少，只占銀行業金融機構的 0.68%，而我國農村常住人口占總人口的 41.48%，農村居民的金融需求並未得到有效滿足。因此應進一步降低農村地區金融服務准入門檻，鼓勵社會資本積極參與小型金融機構，滿足農村地區多樣化的

金融需求，提高農村金融效率，切切實實發揮金融發展的增收效應。

第二，對金融機構而言，一方面需要精準提供金融服務。我國幅員遼闊，各地農村特點不同，農業特色也不同，對金融服務的需求也不完全一樣，同時不同地區對金融服務需求的差異性也會受收入水平的影響。因此在提供金融服務時，應根據各地的特色創新金融服務，提供精準化的金融服務。2016 年在河南省蘭考縣創造的普惠金融“蘭考模式”就是根據每家每戶的金融需求提供金融服務，為農村居民提供無條件的授信，這就做到了金融服務的精準化，也提高了金融服務的效率。期待“蘭考模式”能推廣到更多地區，也期待各地區能在金融服務深化方面持續深耕，而不僅僅只是提供同質化的服務。另一方面，也需持續刺激、挖掘農戶對農村金融服務的需求。隨著普惠金融的發展，農村地區基本的金融需求得到滿足以後，就需要持續、不斷地刺激、挖掘對農村金融服務的需求。這就需要借助互聯網技術，加大金融知識的宣傳，提高普惠金融的普及程度，讓農民充分瞭解國家的惠農政策，用好用活這些政策，讓政策落實到地，讓農民真正得到實惠。在不斷提高農民的金融意識，挖掘農民對儲蓄投資類的金融需求時，也要不斷提高農民的風險防範意識和金融詐騙意識，保障金融資產的安全。

第三，對農村居民而言，需提高自身的金融素養。普惠金融的發展對農村居民的金融素養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王姣（2019）認為農村居民的金融知識、金融態度、金融行為以及金融技能等方面都顯著地落後於城鎮居民^[28]。而良好的金融素養，對於選擇合適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做出理性的金融決策至關重要。良好的金融素養也能保證農村居民在參與金融市場的同時降低金融風險。當然，農戶金融素養的提高離不開政府與金融機構的普及及宣傳。

我們堅信在政府部門日趨完善的金融扶貧政策體系下，將會有更多的金融機構將資源向貧困地區傾斜，為貧困地區提供更精準化的金融服務。

讓廣大偏遠地區的農村居民可以及時地、便捷地以合適的成本獲得高品質的金融服務，真正能從普惠金融發展中獲益。也能發揮普惠金融在脫貧攻堅中的作用，讓金融更好地為三農服務，從而有利於鄉村振興戰略的更好實施，早日打贏這場脫貧攻堅戰。

從 2013 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發展普惠金融至今，普惠金融為脫貧攻堅、鄉村振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了強有力的金融支援。普

惠金融在我國發展的時間較晚，國家關於鼓勵發展普惠金融的相應政策、措施也在不斷地完善落實中，可觀察的年份數據是有限的。本研究運用非線性面板數據回歸方法初步發現發展普惠金融能顯著提升農村居民收入，《規劃》的出臺能加快農民增收的步伐。將來的研究可以在本研究的基礎上，圍繞發展普惠金融政策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增收效應的傳導機制進一步展開研究，從而提高大家對普惠金融政策的理解。

參考文獻

- [1] 郭峰,王靖一,王芳,孔濤,張勳,程志雲(2020).測度中國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指數編制與空間特徵,經濟學季刊,19(04), 1401-1418
- [2] 陳慧卿,陳國生,魏曉博,彭六妍,張星星(2021).數字普惠金融的增收減貧效應——基於省際面板資料的實證分析·經濟地理.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43.1126.k.20210122.1647.002.html>
- [3] 何宜慶,王茂川,李雨純,李佳欣(2020).普惠金融數位化是“數位紅利”嗎?——基於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的視角,南方金融,12,71-84
- [4] 陳丹,姚明明(2019).數字普惠金融對農村居民收入影響的實證分析.上海金融, 06,74-77
- [5] 劉錦怡,劉純陽(2020).數字普惠金融的農村減貧效應:效果與機制,財經論叢,01,43-53
- [6] 黃倩,李政,熊德平(2019).數字普惠金融的減貧效應及其傳導機制,改革,11,243-254
- [7] Sandip, S., Kumar, G. S., & Mollika, P. (2015). Role of banking-sector to inclusive growth through inclusive finance in bangladesh. *Studies in Business and Economics*, 10(2), 145-159.
- [8] 周利,廖婧琳,張浩(2021).數字普惠金融、信貸可得性與居民貧困減緩——來自中國家庭調查的微觀證據,經濟科學,01,145-157
- [9] 劉長庚,羅午陽(2019).互聯網使用與農戶金融排斥——基於CHFS2013的實證研究.經濟經緯,36(02), 141-148
- [10] Enowbi Batuo, M., Guidi, F., & Mlambo, K. (2010).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come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african countries. *MPRA Paper*, 51(1), 1-24.
- [11] Esmail Z.(2008). Neoliberal Development: the Impact of Microfinance on Poverty Allevia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Globalisation (CJOG)*, 1(1).
- [12] Kapoor, A. (2014).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dian economy. *Futures*, 56(feb.), 35-42.
- [13] 羅新雨,張林(2021).數字普惠金融的創業效應:機制、門檻及政策價值,金融理論與實踐,02,17-26
- [14] 溫濤,冉光和,熊德平(2005).中國金融發展與農民收入增長.經濟研究,09,30-43
- [15] 許崇正,高希武(2005).農村金融對增加農民收入支持狀況的實證分析.金融研究,09, 173-185
- [16] 孫玉奎,周諾亞,李丕東(2014).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研究.統計研究, 31(11),90-95
- [17] 余新平,熊晶白,熊德平(2010).中國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民收入增長.中國農村經濟, 06,77-86
- [18] 林秋斌,陳玲(2018).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民收入的影響——基於“一帶一路”的重點省份資料的實證研究.福建農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1(03),30-37
- [19] 李鶴,張啟文(2019).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民非農收入影響的實證分析.統計與決策, 35(06),111-114
- [20] 莊曉棟,許澤慶(2019).中國普惠金融對農村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新疆農墾經濟,11,60-65.
- [21] 趙丙奇(2020).中國數字普惠金融與城鄉收入差距——基於面板門限模型的實證研究.社會科學輯刊,01, 196-205
- [22] Sarma M.(2008).Index of Financial Inclusion.Indian Council for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New Delhi Working Papers.
- [23] 周澤炯,王磊(2014).農村金融發展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效應分析及其檢驗.農村經濟, 10,49-53
- [24] Lin, K. J., Tan, J., Zhao, L., & Karim, K. (2015). In the name of charity: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strategic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32, 327-346.
- [25] Huang, H., & Zhao, Z. (2016).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evidence from Listed private companie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1(1), 1-19.
- [26] Li, W., & Zhang, R. (2010).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Interference: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96(4), 631-645.
- [27] Lins, K. V., Servaes, H., & Tamayo, A. N. E. (2017). Social Capital, Trust, and Firm Performance: The Valu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72(4), 1785-1824.
- [28] 王姣,馬國溫,姚爽(2019).中國農村居民金融素養現狀及提升研究[J].農村經濟, 03,82-84